

# 遊劍仗門國

洪禹平 著



# 游 剑 仗 门 国

漓江出版社

# 国门仗剑游

洪禹平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10 插页2 字数206,700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8000册

统一书号：10256·190 定价：1.55元

## 内 容 简 介

本集包括三个中篇一个短篇。作者以炽烈而抒情的笔触，塑造了仁人志士、思想家、诗人谭嗣同的可爱形象。另外三篇反映现实、当代生活的小说，从不同的侧面刻划了身处逆境而自强不息的赤子、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姑娘、对同志肝胆相照的共产党员、令人尊敬但又有不少弱点的领导干部的生动形象。作品文笔流畅、凝炼，令人回味，促人思考。

## 目 录

海内存知己·····	( 1 )
如同月运行·····	(135)
那个傍晚，那双眼睛·····	(237)
国门仗剑游·····	(252)
一番人作两番人（代后记）·····	(312)

# 海内存知己

(长篇小说《情谊千秋》第一部)

生活在时间中流逝。过去了的事情当然过去了，但有些事也只有过去以后才慢慢地展现它的真面目、它内在的意义。

这已经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何正方离开斗争他的大会会场之后，目不旁视头不回，跨着大步走向单身宿舍。他走进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装有弹子门锁的房门。他这会儿只有一个愿望：让自己独自一个人呆在屋里安静一下。他觉得口干，满嘴发涩、发苦。他倒了杯开水想喝，太烫，只好放下。这时他瞥见桌上那本早晨还在阅读的书——一本俄文的关于函数论的著作。一张书签夹在翻开来的书页上。他早晨就读到这个地方，有个什么问题还来不及思考清楚就扔下了。

他习惯地、迫不及待地坐在桌前藤椅里坐下，拿起书。

他真想回到数学这个秩序井然的、庄严而又安宁的世界中去。这是个多么可爱的世界呵！一切都是可理解、必须理解、值得理解的世界。但他好象再也回不去了，他捧着书出神。

北京的初冬已相当冷，屋里已开放暖气。但这个年青人忘了脱衣服；他还穿着件旧棉猴，看上去有点臃肿，不过仍然掩盖不住他高高的矫健的身材。他那棉猴上的风帽搭拉在脑后，一头乱发，覆盖着一张和他的年龄不那么相称的老成而又风尘仆仆的、黑里透红的脸膛。他那一双细长的眼睛时不时习惯地眯缝着。

五年前，当他还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北方人都说他是典型的南方人——南方那种清寒而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一介书生”。女同学们背地里都喜欢议论他，把这个眉清目秀、一表堂堂、不修边幅、非常用功、但好象发过誓不跟女同学们接近的男同学叫做“傻才子”。他是数学系数一数二的高材生，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可是现在，他变得粗犷了，并且比在学校的时候更不修边幅了。这种外表上的变化，他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没注意到。只有一次，他出差到上海去，在火车上和人聊天，有位从朝鲜回来的志愿军军官说他真象自己的一位年青的战友。那军官因此对他很亲热；他也因此感到高兴，意识到自己从外表到内心已经发生了某些可喜的变化。五十年代初期的青年普遍地迫切要求进步。新中国的蓬勃气象在年青一代的精神面貌上也明显地反映出来。这个年青人当时还对那位军官遗憾地说，他大学毕业那年，曾经报名参加志愿军，但因为工作需要，他只好服从分配，没有参军。

现在，这个确实有点象军人模样的年青人就那么坐在那儿捧着书出神。但他的目光终于被书上的字句吸引过去了。这里讲的一个隐函数问题，他早晨还来不及思考的问题，又在他脑子里一闪一闪地出现了。那些数学符号、公式、数字，好象一群活生生的小动物，使劲挤开他脑子里许多乱嘈嘈的思绪、情绪而钻了出来。他要打起精神重新思考下去。

这样大约过了几分钟，这个年青人却又突然丢开书，长叹一声，站起来，拍拍发胀的脑袋，无可奈何地走来走去。

“嗨！这是怎么回事！”他不出声地对自己说。“如果不回来，如果等到春节回来，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这时，他可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便又连忙坐下。他抽出笔，拿出一本信纸，在上面飞快地写起来：

梅：

我本该早给你写信了，你一定等急了。我前一个星期临时决定回北京一趟，但我一到北京就碰上一件倒霉的事。我本来是完全可以不回来的，那边的研究任务很重，我在那边还忙得很。只是因为我要找一些外文资料，那边领导上让我回来一趟。没想到，我一回来就大倒其霉！——不过，我决不后悔！

这个年青人特地强调他决不后悔，借此消除他心里正在出现的后悔之感。对于这个年青人，在当前这件事上，后悔



就意味着软弱、自私。他稍微停了一下，继续写下去。

事情是这样的：这里一位同志，我以前和他一起工作过，对他比较了解。他工作积极，还颇有才干。但是现在，人们说他是右派分子，给他贴出很多大字报。我看那些大字报都语焉不详，没什么说服力；我又碰巧在饭厅里单独撞见他，我就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他在几次鸣放会上对党提了些意见——不过照我看来还不是对党提意见，而是对本单位个别领导人提意见。有些意见比较尖锐，主要是批评个别领导人在肃反中乱整人。这意见我也有同感，我认为正确的。因此，在几天前的一次会上，我忍不住为这位同志辩护了几句。我本来甚至连会都可以不参加，但我觉得参加并为这位同志说几句公道话是必要的、应当的，因为我对他比较了解。可是，我一说完，有人便指责我“公然为右派辩护”！这是什么逻辑啊？人怎么可以这么来考虑问题呢？他们把自己的看法完全建立在一个正好需要他们认真证明的前提之上：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右派？他提了那么些意见为什么就是右派？

特别可气的是，人们好象并不是不知道这个前提需要争论，但他们总是尽力避开这个前提，而说我对反右运动、肃反运动的态度都有问题，并从这些“态度”问题出发，不断地加以想象、推论，终于得出我“一贯对党不满”、“一贯反

党反领导”等等结论。两天来，人们就这么集中火力对付我，我当然不服气，事情越闹越大。

……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何正方停住笔，还不想去开门。但又是几下敲门声，不过不再那么急促，他上去开了门。

通讯员小张出现在门口。这小鬼先向走廊两头瞧了瞧，然后探进头来说：

“何同志，金书记叫你去一下。”

何正方很喜欢小张。这小鬼初中毕业，工作勤快，又挺好学。他以前常跟何正方学数学和英语；二人一向很亲近。何正方知道小鬼不会斗他，不免带点笑意说：

“又叫我干什么，我不想去了，我要讲的话全讲完了。……”

“不行，——看你还乐呢！”小鬼又回头向走廊瞧了一眼，走进门来，压低嗓门说：“你快别顶牛了，快承认错误算啦！你不承认人家也得承认，他说他拉拢你，说你同情他，说你叫他不要随便承认错误！……他不承认不行，不承认就要划他极右分子！”

“废话！”

何正方一头冲出房门，去找书记。这个五十年代的年青人还觉得这种现象怪得很。

小鬼从后赶上何正方，告诉他，书记叫他到小会议室去。何正方紧了紧身上的棉猴，只管走。小鬼看他是往小会议室去了，也就在后面跟过去。他还有一些话没告诉何正方，但不便说，只是替他干着急！

小会议室里，日光灯一片雪亮。这里已坐着好些人，全是领导干部和党团员。何正方一进去就站在门口，抬头寻找书记。

党委书记金实坐在铺了蓝台布的会议桌一头。他向何正方招招手，叫他过来坐在自己身边一张椅子上。何正方这时忽然想到，在这两天专门斗他的名为“大辩论”的大会上，老书记很少出场，来时也不过坐几分钟就走了，都没说什么话。他平时和书记接触不多，只觉得他知识渊博，随和可亲，科学界的前辈们都很尊重他。现在，他觉得有这位老书记在场并由他主持开会，事情可能不同了，看来有道理可说了。他默默地坐下，觉得周围气氛还挺轻松。

大家还在闲聊，象平常一样有说有笑的。何正方注意到，坐在会议桌斜对面的两个原来跟他在一个研究室工作的同志，正在兴高彩烈地谈一个量子力学上的问题，是关于哥本哈根学派的一些情况。坐在他背后的几个人还在谈论今年初曾经哄动一时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谈论者中间有一个人说自己认识这小说的作者王蒙，说王蒙只有二十一岁，并在王蒙家里看见过周扬同志给他的信，看样子还是肯定这个作品的。何正方默默地坐着，默默地听人聊天；有时也抬头毫无表情地看人。有些人也正在看他。那两位谈量子力学的，还用眼睛向他打招呼，那眼神好象在说：“你啊，何正方，你真是！”他尽量显得不在乎，没有再看他们。他低下头的时候还忍不住微笑了

一下，想到，要是在别的场合，要是他没倒这么个大霉，他早就跟他们坐在一起谈开了。

这年青人真的觉得有点奇怪，在场的这些熟识的或不太熟识的同志，看来跟以前都没有什么两样；他和他们本来也都相处得很好，就是个别对他有点意见的，彼此之间也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敌意。要是在平常，要把他跟周围这些人放在敌对的位置上，那是不可思议的；他自己如果自己放在这样的位置上，那他就是发疯了！而且，他这两天被斗来斗去的这些问题，要是在平常，也很容易说清楚。但现在，他分明处在敌对的位置上，本来很简单的问题也分明变得复杂了。他和别人都好象在等待着事态的某种必然的、非人力所可挽回的发展。这件事看来是他本人偶然挑起来的，但又好象是不可避免的、早已注定的，现在更不是他和在场的或不在场的任何人所能改变的了！——如果这时候能改变，如果这时候他能够重新跟同志们一起有说有笑，那可多好啊！不过，他相信事情总会过去，他总会跟同志们重新一起工作、学习、谈论各种各样有趣的事。这种想望突然强有力地控制着这个年青人，这使他甚至准备放弃自己的意见，接受一切勉强可以接受的批判。他把头往椅背上一靠，闭上眼睛，等着要来的事情快点来，快点结束。

但老书记好象还在等什么，好象还要让大家聊天聊够了再开会。

“好吧，我们开会吧。”老书记终于这么说，同时向大家挥挥手，又向何正方看了一眼。何正方连忙坐好，从棉猴口袋里拿出笔记本，但忘了带笔。老书记把自己身边

带的金笔拿出递给他。

等大家静下以后，金实用他惯常的缓慢、平静、持重的声调说：

“这两天，我们开了几次大会。大家对何正方同志提了许多意见。我们整风领导小组已经研究了一下，有几个问题要何正方同志好好考虑，作个检查。运动嘛，首先应当虚心检查自己。何正方同志因为有别的任务前段时间不在这里，可能没有很好学习文件，现在应该学一下，并且联系自己的思想言行作个检查。好吧，现在先请林海仁同志把有关的问题谈一下。”

林海仁是党委成员之一，是整风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他自己曾经听说上级党委本来已提拔他担任本单位的党委副书记，专门掌握反右运动，后来不知什么缘故一直没宣布。领导小组的正组长还是金实。不过，林海仁觉得掌握运动主要还是他的事，老书记业务上内行，政治上可似乎不如他；这也可见外行领导内行的口号提得多么及时。

他对何正方印象本来就不好，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这个人以专家自居，以内行自居，骄傲自大，目无领导；在肃反中也曾经跟领导唱反调，还顶过他。而这回，情况更严重！林海仁实在难以想象，如果不是有意反领导，破坏反右运动，这个人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跳出来为右派辩护？这对他本人有什么好处？平常党委里有些同志总以为何正方在业务上有两手，很重视他，但不能光看业务不看政治啊！现在大家总算看清楚了，他这股邪气不压下去，运动还怎么搞！

林海仁这一连串有关何正方以及有关业务、政治、内

行、外行、运动等等的想法，与其说是他对这些事物的认识的结果，不如说是他的全部生活和全部心灵活动的产物。有些人往往过分重视严格意义上的认识、思维在生活中的作用。实际上，人常常不是或主要不是靠认识、思维来对待生活的。

林海仁翻着笔记本。因为他识字不多，本子上歪歪斜斜写的字中间夹杂着好些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的符号。他本来也是挺好学习的，只是因为担任的工作很重要，又很忙，没办法、也没工夫学。他的记忆力也很好，文件中常用的许多字句他都一套一套地记得很熟。如果轮到要作报告，他把秘书拟的稿子看一遍，再叫秘书或他的爱人念一遍给他听，就记得差不多了。现在，他翻着笔记本站起来，雪亮的日光灯照着他坚实魁梧的身躯，在墙壁上投下高大的影子。他说话很自信，声音又宏亮，一开口说话，整个空间就好象满是他的声音在回荡。

他说他代表整风领导小组提出五个问题要何正方答复。他说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右运动已经进行了这么长时间，何正方还敢跳出来为右派辩护，当然不能“等闲视之”！于是他熟悉地引了几个反右文件中的许多词句来说明这场斗争的重大意义，说明进一步擦亮眼睛、把反右运动进行到底的重要性。他还一再强调“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最后，他对何正方说：

“群众在大会上对你的揭发批判，你自己都听到了，主要是我刚才讲的这五个问题。现在，群众的觉悟都很高，任何右派分子都逃不过群众的眼睛。你只有老老实实地交

代问题才有出路。党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你应当悬崖勒马，不要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林海仁一说完，全场鸦雀无声。

这时出现了一个可以说是很奇异的现象。从林海仁嘴里说出来的这些话，如果按词句本身的含义来分析，其中大部分词句在一定场合可能是对的，而在另外的场合也可能是错的。但不管它是对的或是错的，它好象都不靠本身的含义在发生作用。它好象只能——也一定能造成一种气氛，一种紧张、严重、使人不得不按照它定的调子说话的气氛。这种气氛几乎控制住在场所有的人，而何正方现在也就在这种气氛中挣扎。

他开头还能一字一句地记下向他提出的问题，同时也确实在考虑该怎么虚心检查自己。但很快，他一个字也不能记了。他只能在这种气氛中挣扎。而这种气氛在全场沉默中还仿佛在升温（它好象真有温度似的）。何正方只感到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血流一股股往头上冲，甚至感到呼吸困难。虽然，林海仁的这些话，他用的这些词句，何正方不是第一次听到，但在今晚上这样的会上听到，由老书记主持的这么一个会上听到，他简直觉得出乎意料。

是的，他知道林海仁对他有意见，所以在大会上，他总是避免谈到直接跟林海仁有关的问题。他本来以为，肃反中搞错了一些人，不完全是林海仁的责任，党委也曾经承担过责任。他的所谓“为右派辩护”，实际上只不过把已经公认的事实笼统地重提一下以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领导人在工作中难免犯错误，向领导人提意见并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过分重视逻辑思维

的人本来以为，这不仅在逻辑上很简单，就是在事实上也是很简单的。但现在，事情显然远不是这么简单了。

特别使他觉得不简单的是，林海仁也决不是一个坏人。不能设想、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设想，林在蓄意打击他、陷害他；更不能设想林海仁故意要把好端端地在为国家工作的同志打成右派。他知道林海仁是三几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参加革命前讨过饭，打过短工，当过道士，确实确实是个被剥削、被压迫、被欺凌的人；参加革命以后打过仗、挂过花，后来在后勤部门工作据说也立过功。这样一个老干部，何正方确实从心里尊重他，只是在肃反中对他提过一回意见。那时何正方还是团委委员，当林海仁向团干部布置斗争一个审查对象时，何正方认为这个对象没有什么材料可以怀疑他是特务或间谍。何正方说：“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人，光知道他跟外国人有些来往，还多是学术上的来往，不能说有特务嫌疑。他如果跟外国人都没来往倒是奇怪的！我们警惕性要高，但嫌疑、斗争，可一定要慎重。”林海仁当时没接受这个意见，并且一定要何正方在斗争这个对象时作纪录，何正方拒绝了；他说自己在心理上不适应，勉强作也作不好。这年青人干什么都认真，这种认真的脾气几乎达到怪的程度。这怪脾气一旦发起来确实没治，多少人劝他作一作纪录也无妨，他却始终一口拒绝，结果受到开除团籍的处分。后来事实证明，那个对象不仅不是什么特务或间谍，而且很爱国。党委给他作了正确的结论并道了歉。不过何正方的团籍没有恢复，因为他拒绝作纪录总是不对的。这在何正方倒也无所谓，因为他这时已经超龄了，只是他本来已经要求入党，也因此没



有被考虑，使他觉得难过。

而现在，据林海仁刚才的意思，他在肃反中那件事和这次反右中的问题都很严重！对这些，老实说，何正方觉得不难对付，只要把事实再从头说一遍就可以了；他觉得难对付的是，到底应当怎么看待林海仁？林海仁为什么要这么冤枉他？而且，显然不是林海仁一个人要这么干——好象大家都要这么干！

这个年青人第一次感到政治生活确实复杂极了。在肃反中，他还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反革命、特务等等，多少总得有点材料，那位爱国的不太出名的科学家之所以挨斗，也因为他毕竟出过洋。何正方的脑子里现在有很多思想的片断混乱地闪过，他想思考一下什么，但什么都不能思考。周围那种气氛还不断地在升温。在座的人都紧绷着脸，越绷越紧。大家——包括何正方自己在内，都好象在等待着温度升高到某个极限时必然出现的事态。

只有老书记多少有点例外。他还跟平常一样在泰然自若地抽烟；不过也跟平常不同，他在一支接一支地抽。按年龄说，老书记不算老，他五十来岁，但身体已开始发胖，很高的额门上边头发稀疏，并已开始花白。他那方方正正的同字脸上两只相隔很开的眼睛老是随和镇静地看人。何正方没有看老书记，但注意到他使劲抽烟的动作和声响，感觉到他随和、镇静的目光从这个人身上移到别的人身上，最后停留在自己的身上、脸上。

“怎么样，现在就谈吧？”老书记向何正方伸过脸来问了一声。

何正方没有回答。这年青人突然把心一横，站了起来。